

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

中國史特別專題：日記與中國社會史(1400-1800) (HIS 5508B)

學期論文

繳交日期：2008 年 12 月 7 日

學 生：劉勇威

導 師：卜永堅 博士

學生編號：07040840

論文題目：

從鄉村社會風氣到鄉村紳士眼中的義和團運動

——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為例

引言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清帝國首都北京為八國聯軍所攻陷。及後和議成功，清國需賠償四億五千萬關兩。身處於山西省的鄉村士子——劉大鵬，遠觀清國受挫於聯軍，兩宮出走；近看國家因戰敗、賠款引致的一連串問題及影響，在日記中默默的將這些事件記錄下來。《退想齋日記》，可謂理解當時廣大沒有或沒怎麼接受城市生活的鄉村紳士心態的重要文本。本文主要通過《退想齋日記》的內容觀察當時鄉村的社會風氣，並主要利用劉大鵬在 1901 至 1902 年的紀錄，以一個典型鄉村紳士的角度，去探討義和團運動及其所帶來的影響。¹

清帝國的官方權力，從中央至地方，僅至縣級便戛然而止。縣級以下的地方，便需要由鄉村紳士作為地方領袖，成為官員與人民間的橋樑，去協助帝國的統治並維繫其統一。這些鄉村紳士，一般都具有功名。而功名的作用，不單是標榜了其與黎庶間身份的差異，更是彰顯了其對地方管治的合法性。而由於這種合法性，與及通過繼續考取更高的功名去獲得官職的機會，令其自然對帝國具有向心力，這便解釋了何以鄉村紳士對維繫帝國統治不遺餘力。明清以來，這種手段一直被沿用。居於山西省太原近郊的舉人劉大鵬，便是這些鄉村紳士中的一分子。在清末，儘管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西力衝擊的影響下，能夠體驗城市生活的人愈來愈多，可是在國家中占大多數的人口依舊是住在比城市偏僻、通訊亦較落後的鄉村。因此觀察劉大鵬這個鄉村紳士，一定程度上亦反映了當時不少鄉村士紳對時局的看法。

鄉村通訊落後與地方偏僻保留的傳統風氣

二十世紀以前的清代鄉村，一般來說有兩大特點：一是通訊落後；二是地方偏僻，這結果造成了鄉村社會的一種風氣，這種風氣的特點是傳統的，穩定不求變革，迷信天意、尊君排外，筆者在本文中名之曰「保守風氣」。相對的，筆者認為一旦鄉村失去了該兩大特點或其中一點時，鄉村社會風氣便會受到城市從西力器物與思想衝擊，由當中例如不同的思想、主義、科技等，較為開放的風氣所感染。就以劉大鵬的 1901、1902 年的日記為例，略加注意便會發現，其生活習慣、行事、言談內容竟然與二百年前徽州的鄉村紳士詹元相所載的《畏齋日記》分別不大。如祈雨、望雨：

¹ 筆者將「庚子拳亂」定為八國聯軍之役事件之簡稱，下同。「義和團運動」則為包括「庚子拳亂」的一系列有關義和團所引發的事件之統稱，特註之以俾讀者得以區別兩詞彙之不同所指。

二十七，天晴。因上年往方規埕請水有功，僉議復往此處。身等接至大秋嶺洞。《畏齋日記》²

今朝大晴，雲皆席捲而去。望雨之情，為之大失。《退想齋日記》³

留心物價：

是時新穀小秋口價錢七分一秤。《畏齋日記》⁴

當此之時，菽粟騰貴。斗麥千七八百文，斗米千四五百文，斤麵六七千文。《退想齋日記》⁵

迷信：

豈亦拜禱之忱，果有以感格耶？《畏齋日記》⁶

戾氣郁結，上千天怒，此雨之所以難得也。《退想齋日記》⁷

討論府縣得失：

邑中因張公德政有不合民心處……（此撫舉動甚不得上官之體，紛紛告示，無補於民，徒滋煩擾。）《畏齋日記》⁸

官如虎狼，吏胥皂隸皆為官之爪牙。《退想齋日記》⁹

² 康熙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詹元相，《畏齋日記》，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所主編《清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193-194。

³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五日辛未。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頁 784。

⁴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初一日。詹元相，《畏齋日記》，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所主編《清史資料》第四輯，頁 194。

⁵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廿四日庚申。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82。

⁶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初二日。詹元相，《畏齋日記》，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所主編《清史資料》第四輯，頁 194。

⁷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辛巳。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87。

⁸ 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詹元相，《畏齋日記》，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所主編《清史資料》第四輯，頁 232。

⁹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癸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820。

其他尚有譏愚民、留心地方動亂等等諸如此類，茲不盡錄。考《畏齋日記》寫於1700年前後，從詹元相到劉大鵬，此間二百年，行為、思想軌跡的契合度竟如此之高，可見鄉村紳士對於莊稼生活的重視程度仍舊遠比時事、國情為高，足證鄉村社會的保守風氣至二十世紀初也一直沒大變動。當時便有一位美國人親歷其境，記下一則生動的描寫：

在新生活中發展起來的太原，電燈、碎石路、整齊乾淨的十字街道、帶有小湖的公園、音樂廳、劇院、幼兒園、林蔭道、廣場、火柴廠、軍事學校、員警、教養院和半周報等，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但是從太原往南走兩天，所有的外國影響的痕跡都消失了。離開了一些人為兜售香煙而到處貼著巨幅廣告的太原，就感到自己處於中世紀的社會之中。¹⁰

鄉村士紳與城市士紳的分野：電報通訊的獲得

當然，劉大鵬所生活的時代比詹元相時代來說要進步得多，最明顯的象徵便是前者資訊獲得之途徑要比後者要多。除了親歷與「小道消息」外，在《退想齋日記》最常見的便是閱讀「邸抄」這種官方報紙¹¹。劉大鵬也曾閱過「申報」¹²、甚至在1902年的日記看到閱讀該年才開辦的「晉報」¹³。通過這些報章，劉大鵬比詹元相更為瞭解天下大事，但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劉大鵬尚未擺脫通訊落後的情況，這是因為中國早已擁有電報這種當時最先進的通訊方式。周星詒曾紀錄1885年1月25日事謂「初十日酉刻……忽得蘇來電寄。痛悉叔兄于初五日臥病，初九日寅刻棄世」¹⁴，由其兄死亡至得訊不足一日，資訊的傳遞已非郵寄書信、過期報章可比。從本文主要引用的1901至1902年《退想齋日記》而言，當中並沒有收發電報的紀錄，可見其資訊的往返還是停留於閱報階段，較諸十六年前的周星詒時代更為不如。再加上，其主要閱讀官方喉舌的官辦報紙，對資訊的掌握又自會較能得到電報資訊之城市中的紳士、官員為差，因此謂其尚未擺脫落後，是相對而言的。如山西鄉村紳士劉大鵬這種情況，要到1906年郵傳部將保定至西安的電報線收歸國營與1907年正太鐵路鋪設到壽陽才有進一步的改善。

¹⁰ E.A 羅斯著，公茂虹、張皓譯，《變化中的中國人》（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58。

¹¹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三日庚寅。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823。

¹²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己卯。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810。

¹³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三日己巳。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825。

¹⁴ 光緒十年十二月十日。周星詒，《瀛橫日記》，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74-775號（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頁26-27。

從資訊傳遞的差異，令到處於鄉村的紳士一方面承襲了鄉村的社會風氣與傳統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則對比於城市中的紳士、士子、官員在思想與識見上的差異愈來愈大。就以讀「時務書」為例，從《忘山廬日記》中可知，當時居於北京的孫寶瑄，在 1894 年已有讀時務書的紀錄，如讀《危言》、《西事類編》。在 1897 年的日記當中看出其有系統地閱讀了大量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書，當中也包括了中國人寫的時務書。在 1897 年劉大鵬也有讀時務書的紀錄，可是其眼中的時務書卻僅是「《御纂七經》共十六套，《御批通鑒輯覽》兩大套，《皇朝經世文編》四套，《皇朝經世文續編》二套，《康熙字典》一部，洋板」。¹⁵信手在當中取出《皇朝經世文編》而言，這部書是魏源在 1826 年為賀長齡輯成，取法自 1638 年的《皇明經世文編》。1842 年，曾國藩在《日記》中自述曾閱過《皇朝經世文編》。¹⁶這一套數十年前已被廣泛使用去探討已往中國「時務」的文本也被劉大鵬收於時務書當中，從此可推知其當時所謂的時務是如何不合時宜了。

鄉村紳士的孤陋寡聞

像劉大鵬這種鄉村紳士所理解的時務，仍舊跳脫不出傳統知識份子從古代歷史的前車之鑒或用中國式的變法思維去解決現今社會問題之框架。這些人認為中國人所掌握的文化是較西方為高的，洋人只是蠻夷，因此對西學亦甚為抗拒。另外，劉大鵬認為庚子拳亂等中國一系列的禍患肇於洋人的壓迫，但同時不承認洋人的實力，將西方列強不能解釋的強大轉而歸咎於傳統知識份子常用以為藉口的「天、數」這種神秘主義。就如 1901 年的《退想齋日記》云：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此之時，正由治入亂也。洋夷擾亂中華，亦天下之大數使然，非人力所能挽。海禁不開，洋夷莫能入我疆？……中國之亂，自教民始，實自洋夷始。總之，自海禁大開，始咎雖在人，實則氣數使然也。……

即事有感：才知世亂悉由天，人力烏能稍變遷。洋寇入華歸大數，此心方可不愴然。

其二：洋夷結隊入中華，百姓群黎被害奢。擾亂我疆天數使，豈伊奇巧實堪誇。¹⁷

¹⁵ 孫燕京，《晚清社會風尚研究》(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04 年)，頁 157-158。

¹⁶ 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頁 6。

¹⁷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廿三日丁巳。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98。

與劉大鵬的想法不同，庚子拳亂時在北京供職的葉昌熾，這種知時務，有識見的官員，其日記雖也有歸咎於神秘主義之嘆，但其目標並非洋人，而是指向義和團與時政：

初八日，聞京津鐵路，又有警信訛言。義和團夜誦咒，有紅光一點，上升霄際，與日月相輝映，謂之紅燈罩。……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勵精圖治之朝，何以有此。¹⁸

在清帝國與西方列強開戰後，以袁世凱、李鴻章為首的一班控制國家東南一隅的大臣，明白西方列強的實力，倡議東南互保。比如當中李鴻章更乘北京電報中斷，藉口以不能分辨驛遞傳來的上諭之真假，對盛宣懷說「二十五(日)詔，粵斷不奉，所謂矯詔也。」，並毅然抗旨。¹⁹又如張櫛這居於溫州的鄉村紳士(按：其所處之溫州接近通訊發達的滬、杭一帶，資訊流通，較之於處於山區的劉大鵬輩，識見亦較高)，在其《張櫛日記》亦云：

國事如此，大局定見糜爛。而平邑城外又有民燒教堂之舉，風聞不日有法國兵船抵溫，如果如此，吾溫防務其益形棘手矣。²⁰

如葉昌熾、李鴻章、張櫛等較能客觀明白義和團的不濟與洋人實力，而不是將洋人力量強大歸咎於天數，這是長居於偏遠鄉村的紳士如劉大鵬者所不能明白的。

傳統觀念與反洋人的態度

儘管當時已經進入了二十世紀，但像劉大鵬這類典型鄉村紳士對西方世界的無知，在通訊較落後，接觸洋人不多的鄉村地方中可謂甚為普遍，這實在不值得驚訝。當時，會特意跑到鄉村去的，只有傳教士與零星的旅行者。相較於旅行者，傳教士與鄉村紳士的接觸機會較多，當時雖然的確有些鄉村紳士因而皈依西方宗教，但事實上，當中不少人其實動機不純。這類鄉村紳士目的是藉西方宗教的力量來漁利或以糊口，在路遙主編的《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中屢見不鮮，《退想齋日記》亦有類似的記載：

¹⁸ 庚子 (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五月初八日。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4 年)，頁 270。

¹⁹ 李鴻章，《李鴻章致盛宣懷不奉矯詔電》，載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列強侵略 四》(台灣，正中書局，1979 年)，249 頁。

²⁰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廿六日。張櫛撰 俞雄選編《張櫛日記》，(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頁 62。

古城營教民名曰孫學謙為邑生員，行二，人呼二先生，勢焰赫赫。凡被教民控告者，必求孫二先生寬其責罰。陽則恭敬之，陰則痛恨之，恨未能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

(教民)其二：不怕蒼穹不怕人，惟憑洋勢虐群民。今天控眾明天罰，入囊非錢即是銀。²¹

辛丑余到書院，山長李舜徽告曰：廩生某貧困難堪，率其妻子入洋教，希圖每月每人得賑濟銀四五兩，係由官給發。不入教者，無人賑濟故也。

廩膳生員入教：口食衣資沒處尋，雖從夷狄亦甘心；斯文掃地何曾惜，每月惟圖四五金。²²

因此對於像劉大鵬這種代表廣大關注鄉村穩定與和諧的鄉村紳士而言，傳教士給其印象極差，而且更是打破這鄉村穩定局面的罪魁禍首。自有明《洪武禮制》以來，鄉村通過廟宇作為地方公議、體現國家法律的地方，是不容忽視的存在。可是當時不少傳教士不諳地方神明與鄉村社會的結構性紐帶關係，以權勢佔用廟宇為教堂。對劉大鵬而言，這是肆意踐踏鄉村的傳統道德價值：

凡有洋夷教民之處，廟宇神像多被毀壞，而以神舍為教堂。人民敢怒不敢言。夫村莊之有廟宇，猶國家之有社稷也。民以廟宇為各村莊之公所，亦且瞻依。……雖不敢支吾，而積憤已深矣。²³

而洋人的無理要求，官員亦無法阻止：

聞太谷城於前二日，洋人埋葬去年被殊之洋夷。所葬之地乃孟氏之花園，恃勢霸佔。官且聽洋夷之指使，小民何敢抗其霸佔田地房屋乎。埋葬巨費悉取於民，蠹役教民猶且于中漁利。困苦百姓其何以堪。

太谷洋夷葬埋：洋夷仍是葬洋夷，太谷人民苦不支。霸佔花園誰敢抗，亦惟俯首暗傷悲。聞花園主人業經瘋癲矣。²⁴

²¹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丙申。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96。

²²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廿九日癸巳。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95。

²³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八日辛丑。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803。

²⁴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廿八日壬戌。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98。

甚至聽信鄉村「小道消息」，謂洋人干預內政：

昨日有友言，宦於四片者家書中敘一事，謂某知縣得一缺甚劣，具稟辭謝。又銓一缺仍劣，不敢再辭，恐總督見惡，乃乞憐於洋夷。且拜洋夷為義父，求洋夷為伊斡旋美缺。於是洋夷親入川督署，為指夔州府屬開縣，令督俾伊補是缺。川督不敢抗違，即將洋夷義子補開縣知縣。即此一事觀之，非特政柄俾洋夷操之，抑亦廉恥之之道牾亡殆盡矣。²⁵

劉大鵬這種旗幟鮮明，澈底反對洋教、反洋人的鄉村紳士缺乏與洋人溝通的機會。對於抱持同一種想法，卻付諸行動的義和團，劉大鵬對這些人是頗同情的。在 1901 年的山西，清政府已將義和團定性為匪類，而教民對義和團拳民亦同時進行反報復，以報去歲(1900 年)在巡撫毓賢所帶領下殘殺教士與教民之仇。劉大鵬在日記中一方面不斷譴責教民的殘忍；另一方面對義和團拳民寄予同情，在其眼中，1900 年教民被害是咎由自取的：

自道光年間洋夷入華以來，入教愚民日多一日。而教民恃洋夷之勢，橫行鄉裡亦日甚一日。中國之亂，自教民始，實自洋夷始。²⁶

教民跟從洋人助紂為虐，是洋人入侵中國的引路人：

謠言教民引洋鬼子入寇紫荊關。²⁷

一路上人皆說洋寇攻打固關，教民引寇入娘子關。²⁸

教民成群結黨，依附洋夷，虎視眈眈，思欲為亂。……頃聞洋寇督率教民攻入娘子關。²⁹

相較於教民，加入義和團的百姓只是替天行道，懲治洋人與教民：

²⁵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六日己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802。

²⁶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廿三日丁巳。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98。

²⁷ 光緒二十七年元月十三日庚辰。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77。

²⁸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甲戌。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85。

²⁹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己卯。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86。

拳民之起，悉由天意。拳民之戕教民、戮洋夷，由上天之赫然震怒，甚惡洋夷之憑凌中憂(夏)，教民之叛本國而附外夷也。³⁰

義和拳之起十分神奇，……時人論之，皆謂由大臣袒護拳民之咎也，並不謂人情狡詐，風俗侈靡，上天逞怒降此奇災，以使中外之人惶然恐懼，革薄從忠耳。世人憤憤，不知悔罪，以消天譴，則世道之遷流，不知伊于胡底矣。³¹

因此劉大鵬認為教民在 1901 年的反報復行動是無理的，而且對於官員懲辦拳民的行動不敢苟同，並指出這無疑是官逼民反：

聞去日榆次差役將桃村之社首拿去，株求拳民。太谷差役將西賈村之拳民拿去。人心洶洶，莫不忿恨扼腕。邑令如此行事，不畏民之鋌而走險乎。去年練義和拳者，城鎮處處皆有。今日聽洋夷教民之言，差役鎖拿以治其罪，是迫之使變也。急免且有反噬之憂，何況於人。司民牧者，何憤憤若此耶。

當此之時，教民心附外夷，而與我之仇，官反竭力保護。至於戴德之民，官反加懲治，以快夷教之心。蚩蚩者氓，有不離散其心者幾希矣。³²

從反洋人洋教到同情義和拳民

值得注意的是，劉大鵬是將當地「處處皆有」的拳民視為「戴德之民」，並引為己類，說出「教民心附外夷，而與我之仇」，這句「與我之仇」著實「可圈可點」。然而在 1900 年官員、拳民對教士教民肆意殺害、虐待、搶掠的行徑，比今日教民之報復有過之而不及，茲舉記錄當時山西情事之《庸擾錄》以說明：

在山西省城，各教堂均已為兵丁團匪焚毀殆盡，紛紛搶劫物件，與盜賊無異。

³⁰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乙酉。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88。

³¹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廿八日甲午。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88。

³²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辛丑。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90。

六月十三日，毓賢將城內寓居之西人盡行拘獲，殺之于轅門外，共四五十人。又殺百姓三十餘人，皆指為歸天主教者。

毓賢在各教堂中搜獲童貞女二百餘人，盡發官賣。

毓賢將良家婦女拘入署中，指為天主教民，肆行鞭撻，並令出教，如不出教，即須立噉人血一杯。然竟有十五六人舉杯噉血者。慘害多諸，百姓憤怨，人人思叛。³³

於今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並沒有 1900 年的紀錄，但在 1901 年的記載中，屢見讚頌毓賢在山西任巡撫時的「德政」，對其被殺多有不平之言，更有詩悼云：

弔晉撫毓公受法：偉軀殂謝在蘭州，碧血涔涔遍地流。正氣凌霄彌一代，忠魂搖曳遍千秋。黎民墜淚真無限，青史垂名永不休。西向感傷賢大吏，晉陽保障孰堪侔。³⁴

鄉村紳士劉大鵬對義和團有意識形態上的認同，但將對洋人的仇恨，化作對教民的冷血，並以教民被害的原因歸咎於洋人。而由於教民的反報復與「洋捐」徵於民間，更大大激化了鄉村紳士這種激烈的排外思想，特別在當時受庚子拳亂直接影響的省份，如直隸、山西等華北之鄉村，似乎是頗為常見的。³⁵比如佐藤公彥便對當時一位比劉大鵬更為激進，並為此而起事的直隸廣宗縣東召村鄉村紳士景廷賓有一段深刻的描寫：

其傳單上書：「為復仇雪恥起見，重行聚會，書有賞格，殺一洋人賞錢一百吊，殺一教中之人賞錢十吊。」或許是受趙三多入伙的影響，他們以攻打「洋捐攤派」的元凶教堂和教民為目標。³⁶

由於景廷賓走上起事的道路有官逼民反等的因素包含在內，因此在實際上，多數鄉村紳士都會選擇像劉大鵬一樣，以文字、言談的方式，表達心底不滿，以維持其在鄉村中的領導地位，反倒像景廷賓這樣激烈的方式相對而言是比較罕見的。

³³ 所引內文為 1900 年農曆 6 月之事。佚名，《庸擾錄》，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庚子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頁 260。

³⁴ 二月十六日壬子。頁 781。

³⁵ 「洋捐」或「洋差」是時人對庚子賠款以外的地方賠款之統稱。佐藤公彥解釋該款是用作「對在義和團事件的混亂中蒙受損失的教堂、宣教士、教民所作的賠償」。佐藤公彥著，宋軍等譯，《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749。

³⁶ 佐藤公彥著，宋軍等譯，《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頁 758。

政府對外的失敗與對仕途的失望

隨著辛丑條約的簽訂，義和團運動亦漸步向尾聲。然而對於鄉村紳士劉大鵬來說，由義和團運動所帶來的辛丑條約及清政府的一些新改革，令其面對新一輪的衝擊，當中特別是思想層面的衝擊。《退想齋日記》記錄了山西因庚子賠款而「起派八百萬金，吾邑派十五萬金」。³⁷這結果導致急於籌款的地方官員以必得實職官階為餌，令捐納風氣較以往更為盛行：

凡出捐輸金者皆賞給實職官階。現在因捐輸而得官職者紛紛，上至道台知府，下至知縣教官雜職，皆因捐輸而得。名器之濫，如此其極。無論至賤之人，亦有官職在身，殊可慨也。³⁸

對於當時這種情況，劉大鵬極為感慨，說出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說話：

有人謂余曰：「子蓋借捐項以捐一官半職乎。」余應之曰：「進取之心，誰能無之。但得之不得曰有命，非必藉捐納即可得官也。人若看不破此，遂妄開徑竇以求作官。無論由此而未必能得，即或可得而究未免身敗名裂之憂矣。且此次之捐得官職者，不計其數。天下共有幾缺，安能位置許多捐納之人乎。余所以不作是想者，其以是也夫。³⁹

縱然劉大鵬日常屢以儒者自居，亦發表過「儒教之腳踏實地人易從也」的論調。⁴⁰但在這功名的誘餌中，我們看不到孔子「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的氣魄，只看到一個吃不到葡萄滋味的舉人在理性分析得官之不易。果不其然，這次捐納結果進一步令鄉村紳士感到沮喪：

現在捐納之例大開，無論士農工商，凡有餘財者皆可得官。至寒畯之士，即登科甲，亦多坐困，何況區區生員乎。士皆困頓厄窮，未有甚于此時者也。⁴¹

³⁷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辛丑。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96。

³⁸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戊寅。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804。

³⁹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丁酉。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805。

⁴⁰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乙己。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91。

⁴¹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壬午。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810。

雖然其云「即登科甲，亦多坐困」未免誇張，可是因為庚子賠款造成的捐納潮，令原來已經僧多粥少的官職進一步不足，更甚是有財可得實授的現象，令從正途考試而獲得的官職更為減少。再加上由於義和團運動，引致北方多個省份，包括劉大鵬所處的山西停辦科舉考試。如此種種的確令到鄉村紳士這些沒有實授的生員、舉人失去前進目標而感到極大不安。而在這時，山西地方政府又推行學制改革：

國家變法自強，將天下一切書院改為學堂，遴選士子入堂肄業，學西人之學。凡天文、地理、測算、製造、電學、光學、汽學、兵法武備與一切機巧，俾學者各學專門，延請夷人為教習。⁴²

是次改革對劉大鵬這些鄉村紳士而言是震撼的，因這幾乎等於是否定了這些人汲汲營營數十年之所學。因此，承上述的引文，劉大鵬寫了一段慨嘆的文字：

是誠吾道之一大厄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奈何今之日為孟子所未聞，而竟目見之哉。

抑又思之，道大莫容。斯時雖用夷變夏，而究之夷不能變吾道，將來夷必遵吾道也。此固夷入吾道之一轉機也。吾道如日月，誰得而掩其明焉。

43

劉大鵬已屆中年，改弦易轍不易，唯有決心堅守這一門中國傳統學問以不變應萬變。然而其傳統的價值觀已略見動搖，為了兒子的功名前途，不得不受潮流影響，這可從其兒子進入以義和團運動的教案賠款所籌辦之山西大學堂就讀一事得以反映：

省中大學堂業經有一百六十學生，又招二十六人，……余由館言旋經徐溝遼西，見徐令告示，余稟堂上二親，命瑄兒上省報名應考。

取入校士堂，每月給薪水銀三兩。⁴⁴

⁴²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庚子。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821。

⁴³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庚子。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821。

⁴⁴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八日(1902年10月9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頁 115。引文轉自孫燕京，《晚清社會風尚研究》，頁 163。

鄉村紳士的價值認同與文化危機

劉大鵬所面對的不獨是自身價值認同問題，這顯然包含了更深一層的文化危機。當時流行的西學、時務，對抱殘守缺的鄉村紳士衝擊之餘，並不斷對這批鄉村紳士之下一代進行新知識的灌輸。有學者指出，當時知識界的思想主流業已從吸收西方科學與技術的層面，漸轉而師從西方政治體制。⁴⁵在一定程度上因義和團運動而加速推行的學制改革，無疑是吸收西方科學與技術的需求已下達到基層的知識份子上之表現。像劉大鵬這種鄉村紳士一直等待再次「用夏變夷」的機會時，1905年廢除科舉的上諭，令其終於崩潰了：

昨日在縣，同人皆言科考一廢，吾輩生路已絕，欲圖他業以謀生，則又無業可托，將如之何？⁴⁶

即便是當時如朱峙三這種大呼痛快的年輕一輩，也深深明白到：

今日科舉已成為歷史上陳跡矣，許多醉心科舉之人，有痛哭者矣。⁴⁷

由此可知，受義和團運動餘波所影響，令清政府決心推行的學制改革，其所朝著的方向恰與劉大鵬這些鄉村紳士期望的正好相反，其絕望灰心之情溢於言表。劉大鵬這些鄉村紳士一直引以為傲的傳統學問，今日卻對於晉身仕途一無是處，令他們在晚清社會中逐漸走向邊緣化。

結語

本文通過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為例，觀察當時鄉村的社會風氣，從一位典型鄉村紳士的角度，去探討義和團運動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在觀察鄉村社會風氣當中，本文認為鄉村因通訊落後與地方偏僻，造成一種保守風氣。這股保守風氣直接影響了鄉村紳士的意識形態。由於這種風氣造成的識見、了解不足，令鄉村紳士多數不明時局、也不清楚西方列強的實力，加諸部分傳教士或外國人在地方上各種跋扈行為，以及其後政府開徵之「洋捐」，令鄉村紳士多抱有一種排外的心理。在義和團運動中，這種心理素質令其向拳民傾斜，對教民在庚子拳亂後的

⁴⁵ 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頁 188。

⁴⁶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1905年10月23日）。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 147。

⁴⁷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八月二十日（1905年9月18日）。朱峙三，《朱峙三日記》第十三冊，載《辛亥革命史叢刊》第 11 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 355。

反報復抱有惡感。隨著辛丑條約的簽訂，賠款引致的捐納潮讓導致士子晉身仕途的機會愈來愈狹窄。再加上由義和團運動所引發加速的學制改革，兩者的交互夾擊下，令劉大鵬這種年屆中年，學習傳統功名學問的鄉村紳士感到灰心失望，在晚清最後數年間漸走向邊緣化。時局轉向令這些鄉村紳士感到的文化危機及伴之而來的憂患意識，令人聞之亦不禁為之同情。

參考書目：
(以註釋先後次序排列)

詹元相，《畏齋日記》，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所主編《清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

E.A 羅斯著，公茂虹、張皓譯，《變化中的中國人》。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周星詒《瀛橫日記》，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774-775 號。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

孫燕京，《晚清社會風尚研究》。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04 年。

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4 年。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列強侵略 四》。台灣，正中書局，1979 年。

張桐撰，俞雄 選編，《張桐日記》。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

佚名，《庸擾錄》，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庚子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

佐藤公彥著，宋軍 等譯，《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朱峙三，《朱峙三日記》第十三冊，載於《辛亥革命史叢刊》第 11 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完